

16.04

临汾文史资料

第一辑

(内部发行)

83

河南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汾县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二，不缩小，不溢美，不论长短，不拘体裁。要对历史负责，经得起历史检验。

为了尽快地把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搞上去，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，我们根据全国和省政协撰写文史资料的精神，多次召开会议，研究、布署这一工作。经过各方面的努力，第一期选辑如期和大家见面了。由于我们人员少，水平低，编纂这样的集子经验欠缺，谬误和差错之处肯定不少；同时，基于撰稿者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，所述事实可能不尽翔实，观点也可能不尽正确。因此，望阅历资深的同志看后多提宝贵意见。

本期文史资料在选编过程中，得到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帮助，在此我们表示感谢。并希望今后有更多的单位和各界人士积极撰稿，协助支持，把我县文史资料征集和整理工作搞好。

目 录

周恩来同志给王冠珊先生的一封信.....	政协办 (1)
临汝县解放前教育概况.....	梁超然 (3)
金盘玉碗世称宝.....	张久益 唐子正 (9)
汝州传统特产——粉皮.....	唐子正 (15)
汝州“四知堂”药酒.....	杨德新 (17)
泉温水滑暖生肌.....	王维周 (20)
千年宝刹风穴寺.....	王凌箫 (25)
汝州赋.....	曹培曾 (36)

周恩来同志给王冠珊先生的一封信

政协办公室

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，世界红卍字会临汝县分会医院院长王冠珊先生，接到了周恩来同志从汉口寄来的一封亲笔信，用的是“第十八集团军驻汉口办事处”的信笺。信上写道：

冠珊先生：

大函敬悉。令郎百顺君志切深造，实为一优秀青年，本此迈进，前途是很光明的。至于欲投考陕北公学，现因陇海东段及豫东战事颇为激烈，由汉至陕的铁路，有被截断的危险。如此，则至陕交通颇感困难。如令郎坚欲去该校受训，则请备足路费（持此信则可），设法由豫西绕道西安，直赴陕西枸邑陕北公学分校招生委员会，当可收纳。特复。

此致

抗日之礼！

周恩来 六月六日

王冠珊先生原籍汉阳，后移居襄阳。于一九〇七年在湖北省军医学堂毕业。历任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会员、南京陆军部军医科长、汉口国民教练所所长等职。一九三〇年任临汝县红卍字会医院院长。王在临汝不仅用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，而且还培养了不少医务人员，对西医在我县的传播，起

了先行的积极作用。

王冠珊先生于1938年在临汝任职时其子百顺年仅十八，却胸怀大志，锐意上进，深得其父嘉许。芦沟桥事变以后，日寇气焰嚣张，神州大地遭到铁蹄蹂躏，国家民族命运危如垒卵。爱国志士纷纷奔赴延安，投入党的怀抱。党所领导的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，已成为革命青年共同向往的目标。冠珊先生有鉴于此，也积极支持百顺投考陕北公学。因道路险阻，对陕北情况不很了解，便给在日本留学时仅有数面之交的周恩来同志贸然写了一信。谁知发信不久就得到出乎意料的圆满答复。信中热情洋溢地肯定了百顺的志向，深刻详尽的分析了前进的困难，恳切具体地指出了入学的办法，关怀期待之情溢于言表。王冠珊先生接到回信欣喜若狂，感激万分，认为确属难能可贵。无以为报，乃将其最心爱的、天天诵读不忍释手的、自认为富有哲理的《般若婆罗蜜多心经》手抄珍本，寄奉周恩来同志，以示敬意。

当时，抗战形势异常险恶，国家命运危在旦夕，身为我党主要领导的周恩来同志，肩负党和国家的重任，在日理万机、一刻千金的情况下，还能对一个陌生的普通青年关怀备至，最大限度地满足其要求。可见他随时随地无不关心对青年一代的培养教育。这种极其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，应为革命者奉作楷模。事隔四十多年，我们重温这一信笺仍觉亲切感人！

注：1、周总理原信来自于县档案局；

2、此文是根据县志办公室王维周同志原稿改写。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

临汝县解放前教育概况

梁超然

我于1935年在临汝师范学校毕业。当了两年多农村小学教师，就转到县教育局、教育科任职，从事教育行政工作，直到日寇侵犯豫西，临汝沦陷前夕才离开。因此，对临汝县解放以前的教育情况，大体上有所了解。现在仅根据自己回忆所得，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简单介绍。但因年深日久，记忆可能不全面也不准确，缺漏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。敬希年长有识的同志们给予指正和补充。

一、教育行政

民国以来，临汝县教育行政机构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变革。民国初年叫“劝学所”。第一任所长是范浩然，第二任所长是张德福（聿新）。当时的学校被称为“洋学堂”。群众对新事物不理解，多持惑疑态度。人心仍倾向于读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的“私塾”。学校招生则需要做大量的动员工作，甚至还得用行政命令分派任务，促使学生就学。尽管如此，各校学生名额仍不充足。教育行政机关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学生，因此定名为“劝学所”。1924年劝学所改为教育局。历任局长共十人。有李国栋（仰宋）、尚克勤（励臣）、张光灿（郁文）、王鸿宾（利用）、郭挺英（俊贤）、

任锡三（仲如）、杜方（义梓）、靳古训（徵今）、李清森（震三）、张凤阁（瑞宸）。局内人员编制，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逐步扩大完善起来。设局长一人，督学二人，文书员一人，办事员二人。另外，还有会计员一人，属于“教育款产经理处”成员。因局长兼任处长，附设在局内。1936年开办义务教育，增设义务教育办事员一人。1938年开办民众教育（扫盲性质），又增设民众教育办事员一人（开始时曾称“民教专员”）。教育局人员编制最多达到九人。1940年实行新县制，裁局设科。教育局改为教育科。科长由张凤阁担任，下设督学二人，科员三人，办事员一人。教育经费并入地方财政，教育款产经理处不复存在。原来主管教育经费的会计员并入县政府会计室。1944年临汝沦陷，在日伪统治时期李襄周当了一年教育科长。因为广大人民群众不愿卑躬屈膝去受奴化教育，基本上没有办成什么正规学校。1945年抗战胜利，张凤阁又恢复了科长职务，一切制度也与以前相同。1947年临汝解放，教育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。

二、学校教育

临汝县古称汝州，系直隶州（不属于府，直接归省领导），而且地位适中，向为豫西重镇。教育事业从来就很发达。民国初年，河南全省只有十四所省立中学，临汝就有一所，这就是素负盛名的“省立第十中学”。1934年改名“省立临汝中学”。1943年增设高中班，发展成为完全中学。该校历史悠久，校风严谨。师资配备较高，即在初中阶

段任课教师均系大学本科毕业，且多来自名牌学校，如北大、武大、北师大等。教学质量颇高。周围各县学生纷纷慕名而来。他们不怕山川险阻，不惜长途跋涉，踊跃报名参加。几十年来，为高级学校输送大量合格新生，也为地方事业造就大量有用人材。1929年地方驻军旅长陈希贤捐款三千元筹办一所“县立师范学校”，为地方培养师资。建校之初先招收特别班和普通班各一班。特别班招收中学毕业生，学习时间半年，是短训班性质。普通班招收社会上年龄较大的闲散知识分子，学习时间二年。自第三届开始招收小学毕业生，学制确定为三年。1931年又在女子小学“基础上办起一所“县立女子师范学校”。1935年男师、女师合并，改为“简易师范”，学制四年。临汝师范招生范围很广，涉及附近五、六个县。毕业生数量较大，在解放前的教师队伍中是一支骨干力量。1932年“私立汝阳中学”成立，为临汝县私立中学开创了先例。

抗日战争时期，临汝县教育事业更为发达，是临汝县教育史上的“黄金时代”。首先从数量看，省立学校先后迁汝三所。（一）省立陕县高级棉科职业学校，于1937年迁汝，校长董鑫（品三）。该校是棉科专业，二年制。在临汝期间，培养出大量的棉业技术人才。解放前后，多从事棉检和花纱布之类工作。（二）省立第四小学，原校址在开封，于1938年迁汝，校长丁筱甫。该校在省立小学中声誉较高。迁来之后对我县小学基础教育贡献较大。（三）省立妇女补习学校。原校址也在开封，校长丁汉三。该校招生对象是成年妇女。主要任务是文化补课，属于扫盲性质。但同时也开设一些家事、刺绣、编织等科目，传授简单的生产技能

和技巧。此外，还有“省立安阳高中”，原计划也亦迁到临汝。该校校长杨振东已经来县联系，却被某些“学阀”拒绝，改迁郑县。因为少数人有“门户偏见”，给地方造成莫大损失，实属一大憾事！这些省立学校，师资力量较强，设备条件也好。来县以后，与本县原有学校相互促进，对我县教学水平的提高，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再一方面，抗战开始以后，各大城市相继沦陷，不少教育界的名流学者，纷纷来到我县任教，如王北方、张鲁庵、王培棠等。使我县教师队伍扩大，教学质量提高，成绩非常显著。与此同时，我县私立中学，也在迅猛发展。私立汝阳中学，规模逐渐扩大，1942年也增设了高中班。1939年又增加了一所“私立豫西高中”、县立师范在抗战期间，还招有“自费中学班”，也属于私立中学性质。1946年单独分出，改为“县立中学”。总括起来，仅临汝县城就有中等学校六所。小学方面原有县立一小、二小、县师附小和一初、二初、三初等。

关于学制问题，民国初年，中小学实行的是“四、三、四制”，即初小四年，高小三年，中学四年。那时的高小叫做“高等小学堂”，文化水平相当高，毕业生被人称为“洋秀才”。中学四年，不分高中初中。以后学制改革，中小学改为“四、二、三、三制”，即初小四年，高小二年，初高中各三年。原来的四年制中学，被称为“旧制中学”，毕业生按高中毕业对待。关于义务教育，按照国民党政府的教育法令，中国公民应受义务教育四年，达到初小毕业水平。但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，普及四年制义务教育也有很大困难。于是就采取临时性措施，压缩教材份量，招收年龄较大的学生（十二周岁），要求在一年之内基本上

学完初小四年应学的知识。这类学校定名为“一年制短期义务小学”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国民党政府，调整县级机构，实行“新县制”。对学制也有较大的改革。把原来的普通小学，义务小学和民众学校统统合并起来，改办“国民教育”。乡（镇）设中心学校，保设国民学校。并实行“政教合一制”，中心学校校长兼任副乡（镇）长，国民学校校长兼任副保长。

三、社会教育

解放以前，临汝县的社会教育机关只有一所“民众教育馆”。它的前身是“临汝县图书馆”，成立于1932年，第一任馆长刘国俊（宜生），第二任馆长李襄周。1934年扩大范围，改名“临汝县民众教育馆”。历任馆长共六人，有李玉璞（和庵）、董光宇（明五）、张凤阁（瑞宸）、薛殊（将之）、王允厚、李法彬（景周）。这个机关规模虽小业务范围却相当广泛，当时文化和教育尚不分家。教育机关兼管文化，文化被列入“社会教育”范围，因而也属于民众教育馆的主要业务之一。民众教育馆设在滕公祠内，在它的东院，就原火神庙遗址改建一座简易露天剧院，供本县和外地剧团演出使用。民众教育馆的西院是由原城隍庙遗址改建的小型公园。内有假山一座，荷花池一个，并栽种各种树木和花卉，供游人观赏。还有一个图书阅览室，设在城隍庙大阁楼上，经常对群众开放，民众教育馆的门前，是一个广场。外地来的马戏团、杂技团、木偶戏、魔术班以及说书，玩洋片等各种艺术项目，均在广场演出，由民众教育馆统一

管理。民众教育馆办有“民众周报”，每星期出版一次，对全县发行。该报也有悠久的历史，自1934年民众教育馆成立时，由“出版股”负责人魏其昌（明若）创办以来，几经人事变更，从未间断。抗日战争时期由毛培之继任主编。毛系本县知名人士，颇有文才，书画俱佳。但是一生落魄，很不得志。由他担任周报编辑，正可发挥他的才能和志趣。他主编的周报，内容丰富，除文字作品以外，每期都有讽刺性漫画，针砭时弊，颇受群众欢迎。民众教育馆还配合时令节日，开展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。如“书画展览”、“儿童健康比赛”和其他临时性的社会教育宣传活动。

一九八三年十月十日

金 盘 玉 碗 世 称 宝

——汝瓷古今考

张久益 唐子正

瓷器，源远流长，在我国商代已始烧造，至唐宋两代，更加昌盛。宋时，已有“汝、钧、官、哥、定”五大名窑之称。故，世称我国为瓷器之国。

临汝，古称汝州。周为王畿之地，战国楚梁邑。隋炀帝大业初年（公元605年），始置汝州。它左控襄、许之饶，右联伊、洛之秀。伏牛嵩岳，南北相峙；汝水洗耳，纵横交流。山灵土沃，得天然之独厚；取石作釉，应朝廷之需求。故官廷多命汝州烧造青瓷器物。后周（954年）柴世宗时，烧窑者请瓷器样色，柴世宗批示说：“雨过天青云破处，者般颜色作将来。”自此，天青色因而名贵，汝瓷至宋代身价为更高。因之，宋代在汝州烧造青瓷器之窑，史称“汝窑”，烧造之器物，即称“汝瓷”。

汝瓷，土质细腻，骨胎坚硬，色泽浑厚，含水欲滴，釉如膏脂之溶而不流。扣声如磬，视如碧玉，明亮而不刺目。釉下遍布斑斑小点，犹如俊梨之皮；釉面隐纹纵横，恰似蟹过留痕；或如细碎之冰裂纹；或呈芝麻花型天然图案。这就是亘古以来，史称汝瓷中名贵的“梨皮、蟹爪、芝麻花”。

其釉色，有：柔和淡雅的粉青，古朴大方的灰蓝，海水碧玉般的豆绿，庄重穆静的虾青。还有：葱绿、艾青、茶叶沫诸色。

临汝境内，古汝窑遗址很多。据考察，已发现有26处。主要集中于蟒川、大峪两地，并各有独特风格。如：沿蟒川河两岸，有：严和店、大郭庄、大堰头、轧花沟、苇子园、任村、胡沟、寺沟、桃木沟等十几处遗址。其中，以严和店宋窑遗址规模最大，烧造时间亦长，包含物亦最丰富，也较典型。且以烧造豆绿釉为主，兼烧其它釉色。豆绿釉质，清彻透底，器物多印花和刻花。其刻花犀利而有锋芒，因图案多以团菊纹、缠枝牡丹、海水游鱼、水鸭卧莲、鸳鸯戏水等为多。所以，富有浓郁的民间特色，形成汝瓷的独特艺术风格。另一处在大峪，有：东沟、黄窑、棉花窑、河东、吴家窑、陈家庄、班庄、龙王等十几处遗址。至今，在群众中仍有“东沟到黄窑，七十二座汝瓷窑”之传说。这里，窑场分布极多。其中以东沟旧址面积最大，釉色以天青、天蓝、粉青、葱绿等为主。还有茶沫、虾青、鱼肚白等色。其釉质厚如堆脂，故所烧器物均系素面。因它与钧瓷产地禹县神厚相毗邻，故此，当时器物之造型与釉色，互为影响，有汝、钧难分之虞。

据南宋《叶资坦斋笔衡》记载：“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，遂命汝州烧造青瓷器”（青瓷器，指专为宫廷烧制的汝瓷器物）。而且，“故河北唐、邓、毫州悉有之，汝窑为魁。”北宋，徐兢出使高丽时，曾在高丽宫廷中见到汝瓷制品。事后，他曾描述说：“浚猊出香，亦蜚色也。上有蹲兽，下有仰莲以承之，诸器唯此物为最精绝。”据古陶瓷

专家陈万里先生推论：汝瓷的烧造时间，当从宋徽宗崇宁五年（1106年），上溯到哲宗元祐元年（1086年）的二十年间。这大概就是宫廷命汝州烧造青瓷器的时代，也即汝瓷发展的黄金时期。据《汝州志》载：“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，幸清河郡王张俊第，进奉汝窑酒瓶一对，洗一、香炉一、合一、香球一、盏四、孟子一、出香一对、大奩一、小奩一。盖在宋时，汝瓷已与商彝、周盘同其珍重，宜至今日仅存其名耳。”北宋末年，金兵侵犯汝州，所到之处，搜山拣海，汝窑被毁，工匠遭杀，人亡艺绝。汝瓷，这个闪耀着民族灿烂文化的技艺，自此失传。元朝之后，虽历有仿烧，但，“仿汝而色质均不及汝”，无一成功。正如清代孙灏诗中所写：

“青瓷上选无雕饰，
不是元家始博填；
名王作贡绍兴年，
瓶、盏、炉、球动颜色。
官、哥配汝非汝侍，
声价当时压定州；
皿虫为蛊物之蠹，
人巧久绝天难留。
金盘玉碗世称宝，
翻从泥土求精好，
窑空烟冷其奈何，
野煤春生古原草。”

诗人既对汝瓷作了高度评价，又表达了对它的感慨之情。自元而后，“窑空烟冷”，汝瓷更成稀世之物，一盃一

碗，亦十分难得。故此，如金似玉，世人称宝，置之高阁，视为珍品。《红楼梦》里贾府王夫人，就把汝窑美人觚视若香艳古雅之宝贝，摆在茶几上，以示富贵。汝州一带，曾有“家有汝瓷一件，不愁家业万贯”之说。相传，清末，汝州城有一王三荒者，大年三十夜，因衣食无著，无奈到“文昌阁”自缢，偶遇小偷盗窃珠宝店后至此。小偷以为有人来追捕，丢下只汝瓷碗惶惶逃去。三荒拾起后，到汝州至盛德老店去卖，老板一看，是只“堆釉如脂”的汝瓷碗，真如获至宝，便当即给他五十两银子。翌日，老板又以八百两价转卖给汝瓷商。而后，汝瓷商到海外又换得八千两白银。自此，汝瓷商成了巨商大贾，至盛德老店生意愈加兴隆，而王三荒却置买房产发了家。这便是“一只汝瓷碗，能使三家富”的传说。汝瓷之名贵，堪称稀世之宝。为此，在旧社会，有不少人希图得到汝瓷，不惜雇人四处挖掘，也有人设窑仿烧。但是，这只能是一种美妙的幻想。

解放前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奸商，曾多次在严和店一带十几个村庄附近，盗掘汝瓷。而在一九三六年最为炽烈。是年十月，当地恶霸煽动二、三百人，在严和店汝窑故址进行大规模刨挖。甚至，因此而造成人命事件。窃国大盗袁世凯，也曾派人到大峪一带盗掘过大量汝瓷。汝窑遗址，遭到严重破坏。一九四四年，临汝沦陷，日本侵略者亦在各汝窑旧址进行盗掘，劫去大量瓷器和标本瓷片。使我国这一古老文化遗产，遭到无法估量之损失。

岁月蹉跎，沧桑巨变。解放后，党中央对汝窑十分关心。自此，汝瓷始得复苏。一九五六年，敬爱的周总理曾亲自提出，“要恢复汝瓷生产”，并拨款扶持。在严和店建立

汝瓷厂，进行恢复试制。但因断烧时间长，技艺失传，连釉药出处也很难寻觅，所以，如大海捞针，渺茫得很。面对这些困难，厂领导带领群众，跋山涉水，到处察访，历尽艰辛，百折而不同，终于找到了汝瓷釉药的出处。经选料、配方和千百次试烧，掌握了汝瓷豆绿釉烧造技术。1959年首都大会堂建成后，经年过古稀老工人之手，精工雕饰了玲珑剔透的汝瓷花盆和透花基座，送往北京，受到中央首长的好评。一九七二年春季广交会上，初次展出了失传数百年的汝瓷传统产品。那古朴典雅，熠熠生辉的盘、碗、碟、瓶、炉、尊、洗、鼎，耀眼夺目，国际友人，啧啧称赞。历年来，我国著名古陶瓷专家陈万里、冯先铭、叶哲民和国际友人新西兰的路易·艾利，都曾先后到汝窑遗址实地考察并发表了独有见地的重要文章。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汝瓷生产，一九七四年又在城北赵庄新建了汝瓷二厂，一九八一年更名为“工艺美术汝瓷厂”。迁移城郊后，中央和省、地及科委、外贸等有关部门的领导，更陆续到厂指导，并给予鼓励和扶植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汝瓷生产发展很快，产品逐年增加质量不断提高，花色品种猛增到一百多个。产品不仅畅销国内，而且还远销美国、加拿大、科威特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受国际友人欢迎。面对这些成绩，他们并不满足，在稳定豆绿釉的同时，又对天蓝釉进行研制。在厂党支部得力领导下，科技人员和以郭遂师傅为主的广大职工，积极行动起来，寻找坯胎土，搜集釉药石，观察古窑址，分析古瓷片，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，并经过千百次试验和上下求索，终于摸索出胎釉配方，使天蓝釉接近宋代水平。样品送往北京，经青瓷器专家们鉴定，一致赞许，并宣布汝窑天蓝釉烧

制成功。故此，在省、地、县领导主持下，于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在临汝召开了“汝窑天蓝釉试验成功鉴定会”。邀请了轻工业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国桢、故宫博物院陶瓷科长刘伯昆和研究员付馆长耿宝昌、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继贤、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讲师王晓林、吕晓庄、金宝生和教授叶哲民、河南省轻工学会高级工程师李志毅，省文物研究所所长、研究员安金槐和付所长、助理研究员赵青云、省工艺美术公司工程师郭书刚和工艺师徐国桢等三十多位专家、权威、学者，到会进行鉴定。专家们把新、老汝瓷仔细对比、甄别后，无不叹为今日之天蓝釉，足可乱古宋瓷之真。故此，专家们在鉴定书上写道：“汝窑天蓝釉的试制是成功的，接近宋代水平。特别是圆器更为逼真，是可以乱真的。能达到这一步是难能可贵的。”我国著名老画家李苦禅先生生前闻知汝瓷天蓝釉烧制成功，禁不住激情满怀，挥毫疾书：“天下博物馆无汝者，难称尽善尽美也。”

“好雨知时节，当春乃发生；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。”随着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日新月异地发展，汝瓷——祖国文化象征之瑰宝，在不久之将来，定会妩媚娇艳，更加多姿而生辉。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八日